



首页 → 导师文集 → 世界史 → 倪学德 → 阅读新闻

神秘之旅出兵远东——苏军与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

[日期: 2009-02-10]

来源: 军事史林 作者: 倪学德

[字体: 大 中 小]

分享到:

QQ空间 新浪微博 人人网 开心网 更多

人们一般把1945年8月开始的苏联对日作战称为远东战役。但实际情况却是，当时苏军总参谋部并没有给这次重大的战役行动正式命名。远东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幕，从战役策划到组织实施，反映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深远的政治谋略，显示出苏军统帅部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。

履行义务 师出有名

苏联发起远东战役，既是履行它对反法西斯同盟国所承诺的义务，也有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。

苏联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着激烈战斗的同时，在太平洋战场上却保持着中立态势。苏日之间于1941年4月订有《苏日中立条约》，使两国之间维持着中立关系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美国曾多次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，但苏联方面一直没有同意。

美国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，最直接的目的是缩短太平洋战争进程，减少美军的伤亡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战时担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哈里曼，在1951年向美国国会作证时，曾透露了美国政府更深层次的意图。他说：“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将参加太平洋战争，而在于是否能及时参战，有助于联合参谋总部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。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，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的生命，打败日本之后，红军长驱直入满州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。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‘公众要求’为口实，建立满州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”。简而言之，美国政府害怕苏联“坐山观虎斗”，在适当的时候下山摘“桃子”。

随着红军在苏德战场上的节节胜利，苏联决定在打败法西斯德国后挥师东向，对日宣战。在1943年11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谈起了太平洋战争。艾登表示，在德国崩溃和日本崩溃之间，可能有一个相当长的间隔。莫洛托夫回答说：“间隔不会长。一旦德国投降，即使日本人也会明白他们的真正处境了”。当然，艾登已经听出了其中的含义。

在会议期间的一次晚宴上，莫洛托夫对艾登和美国大使哈里曼说，他们马上要观看一部苏联1938年摄制的影片，描述的是十月革命期间日本入侵西伯利亚的事。艾登装作吃惊地说：“在我看来，这对于一个中立国是不合适的”。可是，哈里曼不愿装聋作哑：“我认为完全合适！”说罢，就鼓起掌来。他举起了酒杯，并且事先作了说明：“如果莫洛托夫先生不愿和我祝酒，我是完全能够谅解的。为我们有并肩对日作战的那一天而干杯！”“为什么不呢？太好了！这一天就会来的”。莫洛托夫迅即回答道。

外长会议结束那天，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，美国国务卿赫尔坐在斯大林的旁边。在一个适当的时候，斯大林低声对翻译说：“注意地听一下，把我下面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给赫尔听：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已作出决定，在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、结束欧洲战争之后，苏联将立即对日作战。让赫尔转告罗斯福总统，这是我们政府方面的立场。但目前我们还要保守秘密”。赫尔听了这个消息后又惊又喜，他立即向斯大林表示：美国人将怀着感激的心情，永远记住苏联准备帮助他们进行的艰苦奋斗。

1943年11月28日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对美英两国首脑说：“一旦德国最后垮台，那时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，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。”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很想苏联参加对日战争，所以斯大林的表态使他们十分高兴。

当然，苏联参战是有条件的。1944年12月14日，罗斯福让哈里曼与苏联商谈参加对日作战问题，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。他摊开地图，对美国大使说：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应当归还苏联”。此外，斯大林还想得到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权，以及中东铁路，并希望维持外蒙古现状。

1945年2月8日，在雅尔塔会议期间，斯大林与罗斯福就此进行了秘密商谈。由于美军在太平洋的逐岛作战中付出了很大伤亡，所以罗斯福迫切希望苏联能够早日出兵。他对斯大林说，日本现在还有陆军400多万人，海军有120万人；美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有160万人，英军有60多万。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，盟军的损失会更大。斯大林握着烟斗，静静地听着罗斯福的阐述。他赞同罗斯福的看法，“我们可以订一个出兵的时间表，我看打败了德国，再有三个月的准备，苏联就可以出兵远东”。同时，斯大林又提出了上述参战的条件。听了斯大林的话，罗斯福显得很高兴。他对斯大林说：“关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，美国政府会充分考虑的”。罗斯福打算接受苏联对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的领土要求，至于中国东北，罗斯福告诉斯大林，蒋介石愿意使旅顺和大连成为自由港。应斯大林的要求，苏、美、英三国就苏联提出的条件于2月11日签订了关于日本问题的书面协定，即《雅尔塔协定》。这个协定最终促成了苏联出兵东北，却损害了中国的利益。

从协定的内容不难看出，斯大林的目的是收复日俄战争中的失地，恢复沙俄丢失的侵华权利。二战后期，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是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，《雅尔塔协定》正是苏联远东安全战略具体化的体现，它是沙皇俄国安全战略的继承和发展，其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疆域，以空间换取时间。

1945年7月，波茨坦会议前夕，斯大林和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举行了短暂的会晤。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，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說道：“苏联政府一定履行对日作战的承诺，我们将于八月中旬参战”。会议期间，由于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，杜鲁门已经不希望苏联出兵了，可苏联偏偏加快了行动的步伐。

日本当局曾幻想通过作出重大让步，请求苏联出面调停，以避免向美英无条件投降，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苏联的宣战通告。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政府向日本发表了如下声明：

“美、英、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促令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，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了一切根据”。

声明进而指出，苏联已参加波茨坦公告，并接受了盟国关于参加对日战争的建议。

苏联政府认为，这是使和平早日来临，使各国人民解除进一步牺牲和苦难的唯一办法。因此，苏联政府宣布：“从8月9日起，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”。

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来看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，履行了它对同盟国所承担的义务，对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贡献，同时苏联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那样：远东战役的结果完全弥补了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“损失”。

万里遣兵 周密部署

对德战争尚未结束，苏军统帅部便开始筹划远东战役。还在朱可夫指挥红军进攻柏林的时候，就接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，要他把在德国境内的第39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，以及在捷克境内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调往国内，做好去远东作战的准备。

调往远东的部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，就是说要符合远东作战任务的需要，并根据其作战经验确定该调往哪个地区。关于这一点，什杰缅科大将这样说道：“最高统帅命令总参谋部加强外贝加尔方面军、远东方面军以及滨海集群的司令部和高级指挥人员，派去更多的是在对希特勒的作战中受过锻炼、而最好又曾在远东服役过的人员。同时最高统帅还吩咐在计划部队的调动时，首先应把在近似远东的条件下作过战的集团军和兵团调往远东”。

在指挥官的人选上，斯大林非常慎重，他几乎把苏军优秀的高级将领都派到了远东，其中有三位元帅，即华西列夫斯基、马利诺夫斯基和麦列茨科夫。华西列夫斯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，是二战时期苏军的著名统帅，曾两次荣获“苏联英雄”称号。他具有丰富的统帅部工作经验，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显示出了卓越的组织才干。马利诺夫斯基是苏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。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，他指挥坦克兵成功地阻击了企图救援被围困德军的曼施泰因军团，并且乘胜追击，一直越过北高加索大草原。他率部从伏尔加河打到多瑙河，先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。麦列茨科夫则是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英雄。1943年1月，在突破列宁格勒德军封锁线时，他指挥的部队在第聂伯河东岸同德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，并突破了德军的封锁。斯大林对他的评价是：“机警的雅罗斯拉夫人，是有办法打败日本人的，因为他在森林地区作战和突破筑垒地域是很有经验的”。从苏联东部的滨海向中国满州进攻，需要越过一大片原始森林，麦列茨科夫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
1945年春，远东苏军只有30个师，并且配置分散，装备也较差。因而，统帅部一着手工作，东调苏军的列车就秘密地开动了。

苏联百万大军的调动，横跨欧亚大陆，行程上万公里，仅仅靠一条单轨的西伯利亚铁路，而且部队的调动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。特别是苏联远东地区的铁路距边境线最近处仅3公里，日本关东军在边境上完全可以看到铁路线上的运输情况。但是，日军对苏军调运车辆的估算还不到实际数量的一半。苏军把如此众多的兵力、武器及其它作战物资从9000至12000公里外的欧洲战场迅速调到远东，又没有被日军发现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苏军的调动，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运输工具。1945年5月至8月，向远东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运去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。4月到9月，共发出火车1692列。其中，运送步兵有502列，运送炮兵为261列，运送坦克兵为250列，运送工程兵和其他部队为670列。在调运高峰的6月和7月，每天晚上发出的火车平均为26列。

部队到达集结地后，还要行军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向展开地域前进，因此苏军往往要靠两条腿走很长的路。

为了加速在远东集结部队，苏军从西部调到东部战区时，大量运输汽车都留在了原地。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坦克甚至也留在了原配置地域，后来部队在远东车站下车后，即得到了从乌拉尔坦克工厂预先运去的新坦克。

为了达到进攻的突然性，苏军不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，而且还采取了一些迷惑日军的行动。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向斯大林介绍部队调动情况时说：“我们所有的调动，都是用演习的命令下达的。边防部队仍然在按原计划巡逻。当地驻军也在正常休假。边防部队仍然像往常一样割草，并且有意在日本哨兵看得见的地方晒干草”。

“边境上的居民怎么样呢？”斯大林关切地问道。

“还没有撤走，但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两天时间就可以全部撤走”。安东诺夫很有把握地回答了斯大林的提问。

“很好”。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。

安东诺夫接着说：“所有的坦克、汽车、火炮全部进入了地下坑道，上面进行了伪装。我们还采用了严格的无线电控制，新到的部队一律不准使用电台”。

为了麻痹日军的情报机构，苏军指挥部不让部队进入居民区，也不要同居民接触，并且禁止做饭和砍伐树木。

“到前沿观察地形的指挥员一律穿士兵服装，指挥员用的都是化名”。安东诺夫继续向斯大林介绍说。

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安排，派往远东的三位元帅一律使用化名，他们前往远东时都奉命摘掉了元帅肩章。麦列茨科夫率方面军司令部到远东时，他们乘坐的特别快车伪装成普通列车。为了防止走漏消息，在列车到站前就挂出“票已售完”的牌子。麦列茨科夫告诉手下的参谋说，他们将去新西伯利亚。等到了新西伯利亚，他又说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，以后又说去伊尔库茨克。到伊尔库茨克又说去哈巴罗夫斯克，一直到了哈巴罗夫斯克，麦列茨科夫才宣布终点站是伏罗希罗夫市。有一个中校军官，利用列车在鄂木斯克停车的机会，给妻子发电报告诉了他此刻所在的地点，结果这名军官在党小组会议上受到了审查。当然，他发出的电报已经被截收了。

麦列茨科夫的化名是马克西莫夫上将。刚到远东时，他在滨海集群司令部开会，第一次向大家自我介绍说，我叫马克西莫夫。会后，一位军官走到跟前问麦列茨科夫：“您没听说人们都在谈论麦列茨科夫元帅到我们远东来了吗？”麦列茨科夫只好说没有听说过。

在后勤保障方面，苏军建立了200多座大型仓库、若干个野战医院和油库，储备的物资足以供150多万人使用。另外，苏军还研究了远东战区一些特有的后勤保障问题。考虑到在满州部队必须食用一些在苏联不常见的粮食作物，如高粱、小米等，后勤机关专门编写了关于这类作物食用方法的说明书，发给各参战部队。

日本认为苏联在远东地区战争潜力薄弱，西伯利亚铁路运输量有限，苏军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，起码到8月底才能就绪。但是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，在8月的头几天里，苏军在边境地区已集结了160万大军，并且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。

两翼合围 向心突击

关东军号称“皇军之花”，是日本陆军的精锐，总兵力近100万人，有作战飞机150架，坦克约160辆。尽管日军的现代化装备不如红军，但由于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，关东军的战斗力仍然不可小觑。

鉴于中苏边界走向有利于对敌形成包围态势，苏联决定东西夹击，合围关东军的主力。1945年6月底，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从两个方向，即由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突出部和苏联滨海地区实施向心突击，同时在其他各个战役方向上，实施一系列辅助

攻击，一举歼灭日军主力。

7月30日，苏联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军总司令。远东军由后贝加尔方面军、远东第1方面军和远东第2方面军以及太平洋舰队组成。后贝加尔方面军65万余人，从蒙古东部向沈阳、长春方向实施突击。远东第1方面军兵力近60万人，从双城子等地向牡丹江和吉林方向实施攻击。远东第2方面军兵力30余万人，从饶河地域向哈尔滨方向实施进攻，协同上述两个方面军分割围歼关东军。太平洋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日本海域积极行动，切断关东军与日本的联系，协同陆军在朝鲜东海岸、南库页岛、千岛群岛登陆作战。

这样，在苏军统帅部，一个规模空前的战略性进攻战役计划形成了。其展开正面达5000公里，战役纵深为600至800公里，兵力多达80个师，158万人。

远东战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，红军进攻的道路上既有森林覆盖的高山，水深浪急的河流，也有干旱无水的沙漠。在中苏边界的东面，有牡丹江和兴凯湖，还有太平岭、张广才岭和老爷岭，这三条山脉绵延达400多公里，犹如一堵天然屏障矗立在中苏边界。此外，这里还生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。在中苏边界的北面，有连绵不断的小兴安岭和广大的丘陵地带，还有流经中苏边界的黑龙江。在西面的中蒙边界，有蜿蜒起伏的大兴安岭，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，在大兴安岭的南部分布着浩瀚的沙漠。

战前的最后一个夜晚，空气似乎突然变得稀薄了，人们呼吸都显得异常紧张。在后贝加尔方向，星空万里，烤晒了一天的大地，犹如揭去盖子的蒸笼，热气袭人，静卧在进攻出发地域的部队，感到十分疲劳和干渴。而在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，则是乌云滚滚，雷电交加，倾盆大雨引起了山洪爆发。洪流冲毁了道路，吞噬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，似乎象征着苏联红军进攻的磅礴气势，预示着关东军不可挽回的失败命运。

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，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都跨越了国界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、乌苏里江和黑龙江，分别从后贝加尔、滨海地区和黑龙江沿岸进入我国东北境内，在5000公里的正面上展开了强有力的进攻。

日军主力集中于长春和沈阳地域，因此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任务是，迅速穿过数百公里的沙漠和翻越大兴安岭，寻求与关东军主力决战。战役一开始，坦克部队在各路打头阵，铁流滚滚，锐不可挡。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，沿三条行进路线，开始了它历史上最艰难的行军。蜿蜒数百里的大兴安岭，山高林密，坡陡弯急，有的山口被断崖封闭，有些地段被大片水洼切断。就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区，部队十分艰难地行进在悬崖峭壁之间。直到8月11日，第6集团军才全部爬上大兴安岭。下山时，正逢大雨，部队行动非常困难。在战争史上，自从有了坦克后，还没有哪支部队像苏联红军那样，竟然将坦克开到了崇山峻岭上。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回忆录中说，“强行穿越兴安岭之役是现代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英勇业绩”。12日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全部越过大兴安岭，并急转向南，以每天180公里的速度向沈阳方向挺进。仅三昼夜，集团军就推进450公里，攻占了鲁北、突泉一线。14日，集团军攻取长春西部重镇洮南。这样，到战役第五天，后贝加尔方面军已前出到东北平原。

远东第1方面军却是另外一种情形。在这里，日军依托边境筑垒地域顽强抵抗，战斗十分激烈，苏军进展缓慢。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第5集团军正面，是日军的绥芬河筑垒地域。苏军每前进一步，都要浴血奋战，付出巨大代价。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收到的作战报告显示，每个筑垒要点都是经过激烈战斗后才被攻占的。与第5集团军并肩突击的红旗第1集团军进攻地带，是难以通行的原始森林和沼泽地。这里森林茂密，古藤缠绕，到处是沟壑和溪流。苏军通过时，每一纵队都派先遣支队侦察，标明行进路线。先遣支队的坦克撞断树木，开辟通道。再后面是桥梁分队，负责清理被推倒的树木，架设桥梁，完成急行军路的铺设。苏军冒雨前进，整整一昼夜才走了五、六公里。到14日晚，远东第1方面军向前推进了120—150公里，先后攻取绥芬河和密山等筑垒地域。

担任助攻的远东第2方面军在松花江方向上与日军独立第4军隔江对峙，主要任务是切断独立第4军与关东军的联系，配合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作战。苏军渡过黑龙江后发现，日军除留较小的守备部队外，主力已撤往腹地。为了减轻对远东第1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压力，远东第2方面军必须立即追击。但松花江的水位雨后猛涨，沿岸道路被冲毁，到11日黄昏，苏军才占领富锦县城。盘踞在富锦南郊的日军仍然阻挡着苏军前进的道路，经过多次白刃格斗，到13日晚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抵抗。远东第2方面军很快占领佳木斯，进而向齐齐哈尔方向发起进攻，有效地牵制了日军。

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于是，苏军转入进攻的第二阶段，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。18日，华西列夫斯基给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下达了组建快速支队的命令。20日至21日，东西对进的苏军快速支队分别在沈阳、哈尔滨和长春会合。22日，苏军在旅顺、大连实施空降，25日，占领朝鲜的平壤、咸兴等地。少数日军部队拒不执行关东军的投降命令，清剿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30日，关东军才被全部解除武装。根据苏军战史资料，远东战役中消灭日军约70万人，苏军伤亡3.2万人。

远东战役虽然历时不到一个月，但苏联红军在战役组织的许多方面却是可圈可点。其战役组织的主要特点是：准备充分，完全掌握作战主动权；从西线向远东实施战略机动，在兵力对比上形成压倒优势；采取一系列伪装和保密措施，达成战役的突然性；集中优势兵力，正确选择进攻方向；采取东西对进的向心突击，实施大纵深的多路进攻；成立战区指挥机构，实行统一的后勤保障等。

对于远东战役，西方的战史学家向来是轻描淡写的，这显然带有冷战时代复杂的国际背景。实际上，这场战役不仅是促成日本投降的重要因素，而且在现代军事学术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。

本文主要参考资料

[1]（俄）H.A.舍福夫：《俄罗斯最著名的战争与战役》，田永祥等译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。

[2]（苏）M.B.扎哈罗夫：《结局》，隗青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。

[3]（苏）亚·米·华西列夫斯基：《毕生的事业》（上、下册），柯雄译，三联书店1977年版。

[4]（苏）K·A·梅列茨科夫：《为人民而战》，王树森等译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。

[5]（苏）尤·施切宾尼科夫：“争取正确阐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”，载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编：《二战史通讯》，1985年第7期。

[6]（日）林三郎：《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》，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[7]（日）法眼晋作：《二战期间日本外交内幕》，袁靖等译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。

[8]（英）F·C·琼斯等：《1942—1946年的远东》（上册）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。

[9]汪宇燕、何明：《苏联出兵东北始末》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。

[10]王书君：《第二次世界大战百幕风云》（下），蓝天出版社1994年版。

[11]郑寅达：《会议桌上的世界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。

[12]李凡：《日苏关系史（1917—1991）》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。

（原载《军事史林》2009.1）

上一篇: 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得失
下一篇: 倪学德近年著作论文目录

相关新闻 二战

-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“先敌后亚”战略的不同 (11/02/2012 03:57:06)
-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(09/08/2009 13:08:50)
- 《波茨坦公告》 (10/04/2008 05:50:10)
- 二战漫画艺术 (01/19/2010 11:24:54)
- 日本天皇投降诏书 (10/04/2008 05:51:49)

本文评论 全部评论

发表评论



点评: 字数

姓名:

- 尊重网上道德,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
-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
-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
-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
-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